

黑土地上的白毛女

文\畅惠忠 袁子伟



人生驿站

1968年11月,嫩江农场文艺宣传队成立。十年间,宣传队人员也在不断变化。宣传队结合当时国家和农场的形势、农场的具体情况,排演了许多广大知青、农场职工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1971年,大家决定来一次突破,排演全场芭蕾舞剧《白毛女》。队员们顶着巨大的压力,通过艰苦的努力,用实际行动向农场领导和广大知青朋友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一切都从零起步。宣传队成员都是刚出校门下乡到农场的知识青年,没有谁经过专门训练,凭着“一颗红心”、“满腔热情”,就大着胆子决定排演《白毛女》。

宣传队先是派几个人去哈尔滨抄总谱,不会看五线谱就翻成简谱来练。没有导演,没有专业人员指导,舞蹈动作就靠大家回忆电影中的场景,动作,你一言、我一语,比划着来。乐队的同志们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先把各自过手的曲子练好,再一起和。

最值得一提的是,跳芭蕾舞时女演员需要立脚尖。咱们宣传队的演员是“老三届”的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袁子伟也有19岁,到这个年龄才开始接触技巧要求极高、只有专业演员才能完成的舞蹈动作,难度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立脚尖时近100斤的体重全部吃在足尖,大脚趾的趾甲出血了、化脓了、变黑了、脱落了,其他脚趾的皮也磨破了,血水与纱布、舞鞋粘在一起,脱也脱不下来,一站起来钻心地疼。个中艰辛和吃的苦受的累遭的罪,无处去说,只能咬着牙坚持排练。

农场条件有限,布景、道具,都是大家自己动手去做。比如,演出中表演焚烧地契时抬出的大鼎和徐徐升起的太阳,这两件比较大的道具,就是大家集中智慧,反复研究、摸索完成的。那个大鼎,是用柳条模仿编筐的方式编成的,再包上布、涂上颜色,远看极像是青铜制作的。中间安一个小电机,通电时把红绸布吹起来,特别像燃烧的火苗。每场演出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而红太阳的道具,是用木板钉成扁箱,前面开一个大圆孔,衬上红纸,内安灯泡,根据剧情需要,由专人在天幕后通过滑轮慢慢把灯箱拉起来,效果是天空中一轮红日徐徐升起。

宣传队采取能者多劳、共同补台的原则,大家都尽量多地承担任务。本来负责打击乐的我,同时兼任着全剧的指挥工作。通过指挥乐队的演奏,使得乐队的节奏、情绪和舞台上演员的表演高度一致、相辅相成。需要增强气氛时,我就按照乐谱规定加入花盆鼓和吊镲。

演员们化好妆、穿上演出服装,是光彩亮丽的。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有的演出场地条件极差,去分场就是在食堂的小舞台演出,冬季室温极低。观众穿着棉衣、棉鞋在台下看演出,台上的演员们只穿着单衣唱歌、跳舞,嘴都冻瓢了,还要硬挺着微笑,多难啊!记得一次大冬天,农场领导带领宣传队去关系单位慰问演出,剧场舞台十分简陋,室温极低。大家不讲条件,克服困难,照演不误。对方单位领导看在眼里,派人准备了几盆炭火,放在舞台上,供大家暖暖手脚。演员们挨冻的情况有所缓解,可在不经意间出现了晕乎乎、飘悠悠,脚踩不实的感觉。原来是一氧化碳在捉弄我们。好在及时发现,大家立即把炭火盆撤走,最终有惊无险。

我们和知青是好朋友。分场演出时,许多知青朋友为我们跑前跑后、帮助张罗,总是希望为我们做些什么。如老友重逢,似兄弟久未见面。有一些知青朋友,打听好宣传队演出的路线,事先从自己的分场步行赶赴别的分场,看完演出后再摸黑赶回自己的分场。寒冷的冬天,分场的知青朋友们,把住宿的屋子烧得暖暖的,把最干净的被褥让给我们,他们到别的宿舍挤着住。我们尽管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是知青的情谊却深记在心。每当想起这些,还是热泪盈眶,感慨多多。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蓦然回首

1970年,那是我下乡插队的第三个年头。那一年风调雨顺,加上我勤扒苦做,年终分红破天荒地分得了15元现金。一天赶集时我狠狠心,决定下顿馆子,弥补一下肚子的长期亏空。

在镇上那家唯一的小饭馆门口,我刚要进去,忽听身后有人吆喝,“谁买单车,谁买单车,便宜呀。”我好奇地扭头一看,见一个中年汉子推着辆插着草标的单车边走边吆喝。我眼睛一亮,“多少钱?”“你要真买,这个数。”他竖起了两个指头。20元,价钱倒还说得过去,我心中暗想。

于是近前细看起来。谁知这车粗看还行,细瞧就叫人扫兴。首先它无铃,无闸,无锁,遍体锈迹斑斑,没有一点儿亮光,显得老态龙钟,憔悴不堪。更奇的是,它的前轮外胎几乎磨平,有好几处地方,内胎探头探脑地要挤出来。车主倒是会穷对付,在破损处另绑了一层半尺左右的外胎,我数了数,嗨,竟有三截。

我撇了撇嘴,“就你这破驴(当地老乡习惯把单车叫洋驴子,我也入乡随俗),还要20元?”

“你别光看外胎呀,这可是名牌车——加重‘永久’呀,你瞧

“瘸洋驴”变奏曲

这车的骨架,多硬朗!前叉、后叉、三角架,没磕没碰没变形,还有这加重的后轮,稳着呢,驮上两三百斤东西保证没问题。”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又动了。老实说,从我小学五年级学会骑车的那天起就开始做买车的美梦了。下乡以后,这种愿望愈加强烈,要知道,我插队的地方离最近的集镇也有十几里地,赶一趟集,来回光走路就要花去四五个小时,有了洋驴子,那以后咱可就“解放”喽。

想到这,我毅然决定买车,可翻遍口袋,甚至连几个钢镚也加上了,也只有17元。

中年汉子迟疑了好一会儿,最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于是,18岁的我就成了这头骑一圈颠三颠(前胎上有三道坎呢)的瘸洋驴的新主人。

让我意想不到的,这头瘸洋驴进门不久就给我带来一个小小的机遇。公社驻大队工作组知晓我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决定吸收我参加一个重要的外调工作。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要知道我家庭出身不好,充其量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现在组织上不惜丧失“原则”,对我如此重用,细想还真是沾了瘸洋驴的光。

于是,在以后的三个多月,我骑着这头瘸洋驴,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疲倦地颠簸在宿迁——古邳——睢宁的集镇和乡间小路上。这头瘸洋驴也真争气,虽然灰头土脸,全身“关节”格格作响,但从未中途罢过工……

外调归来后,我的瘸洋驴倍受队里年轻人的青睐,因为它可是“庄中第一驴”呀,谁都想学着骑两圈过过瘾,赶赶时髦。

最有趣的是瘸洋驴还做过一次相亲道具,“骗”来一个媳妇。庄上一个叫丁宝的大龄青年,眼瞅着奔三十了,可因为家中贫寒,相了几次亲都黄了。他不会骑车,现学又来不及,没办法,为给自己添点底气,竟推着瘸洋驴,走了十几里去和姑娘见面。戏演得相当出色,对方一看他是“有车一族”,以为其家境殷实,爽快地订了婚。殊不知小伙上门时穿的胶底棉鞋和半新的带毛领短大衣都是借我的全套行头。

1973年2月初的一天,我就要离开那个叫小丁庄的地方,到遥远的外地去谋生了。为了凑足路费,还是在那个灰蒙蒙的集镇,那头见证人生苦乐、一步三颠的瘸洋驴被我用14元的价格忍痛卖掉了…… 龚琦



■ (左)杨白劳由鄂岩扮演,喜儿由董慧瑛扮演;(右)嫩江农场上海知青再聚首



难忘往事

1969年秋末初冬的一个下午,我们几个上海知青从安徽省的濉溪县县城徒步赶往60里外的某生产队——我们下乡在这个生产队。天公不作美。当我们朝西走了3个多小时后,老天下起了小雨,而这一下就没有停止过。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土路上,借着微弱的夜光朝“家”的方向摸索地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的时间后,我们迷路了,因为我们不知身处何地。周围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丁点的村庄所散发出煤油灯的灯光。此时的我们又累又饿,还有点慌张。为了保存体力和镇静大家的情绪,周佩铭决定让大家原地休息。可是,周围都是泥泞的土路

或者田地,让人根本无法坐下来休息。正在此时,有位同学看到旁边似乎有几个“土墩子”,便招呼大家各找一个“土墩子”蹲了上去。尽管“土墩子”也是湿漉漉的,但好歹要比站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强一些。就在我们刚蹲上“土墩子”不久,大家就被强大的“瞌睡虫”给打倒了,很快就在“土墩子”上采用蹲姿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周佩铭被一阵寒风给吹醒了。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小雨也不知是何时停止的。他打着哈欠从“土墩子”上下来后揉着眼睛朝四周随意地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看后顿时把他给吓了一跳:原来我们昨晚所蹲的“土墩子”并非什么“土墩子”,而是乱坟岗里大小不一的坟

夜宿乱坟岗

头!而且有好几个坟头都已经开裂了,露出里面破烂不堪的棺材板。周佩铭连忙叫醒还在坟头上酣睡的那几位同学。当他们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居然是在坟头上过夜的,一个个就像触电一般赶快从坟头上跳了下来。我们相视片刻后突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大家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了,头发乱糟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两眼通红,本来已经是菜色的脸上不仅有雨水的残留还有不少小泥点,大家活脱脱地像刚从地狱中逃脱出来的“牛头马面”。

太阳从东方冉冉地升起来了,大家极目朝西的方向望去:嘻嘻,我们所下乡的那个生产队距乱坟岗不足500米的距离!

周佩铭 陈抗美